

## 《商會與近代中國政治變遷》評介\*

李達嘉\*\*

李培德編，《商會與近代中國政治變遷》。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年。  
198頁。

清末由於外力衝擊接踵而至，國家面臨艱鉅挑戰，經過幾次戰敗和訂約的衝擊後，有識之士逐漸體認西方各國對中國進行軍事作戰不過是一種手段，其真正目的則在通商。因而提出商戰的主張，認為必須振興工商，厚植國力，才可以抵抗外力入侵。在此思維下，仿倣西方國家設立商會，成為政治變革的重要內容之一。1902（光緒28）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設立，為中國最早的商會組織。1904年清廷頒行「商會簡明章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全國各地陸續設立商會。民國時期，商會組織持續發展。中共取得政權後，以工商聯取代商會組織。至1980年代，隨著中國大陸工商經濟的發展，商會組織又逐漸湧現。

商會設立之初，清廷規定其職權範圍限定在地方商務事宜，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但因商會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振興國力，而且商務牽涉的範圍極為廣泛，政治良窳對商務興衰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商會成立以後，經常逾越商務的範圍，對國家和地方政治事務表達意見。經濟力量雄厚的商人，藉由商會組織凝聚，政府亦不敢輕忽其影響力。近代中國商人、商會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學界極感興趣的課題。西方學者如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論述中國資產

---

\* 本文承蒙一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2年11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12月2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階級與國家發展的關係；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探討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以國民黨和商人組織的關係來分析國民黨政權的性質，都是學界熟悉的著作。中國大陸學者在1980年代以後，逐漸展開商會史研究。起初因為受到馬克斯主義史觀的影響，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將商人和商會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商人和商會都被賦予反革命、反國家民族利益的負面形象。隨著中國大陸工商業的發展，以及對新事物、新思潮的接納，學者們逐漸擺脫舊框架的束縛，開始從新的角度來解釋歷史。西方學者近年關於近代中國是否出現「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等的討論，都對中國商會史研究產生了影響，為這個領域提供更廣闊、更深刻的視野。

本書以商會與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為中心的討論，正可以反映中國商會史研究方向的轉變。這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李培德教授主編，《近代中國的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一書的姐妹作。書中共收錄論文 7 篇，執筆者除李培德教授外，其餘 6 位為：香港《明報月刊》前編輯張志東、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忠平、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葉漢明、華中師範大學校長馬敏、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何佩然、香港愛德基金會海外幹事張素玉。書前有章開沅教授為本書寫的短序，書末有李培德編的〈中國商會、商人團體史研究文獻目錄〉，收錄截至2007年12月止已經出版有關中國商會、同業公會、行會的中、英、日文相關文獻、研究，以及學位論文，相當齊全。7 篇論文的主旨概述如下。

張志東，〈制度合作與國家建設——提供一個理解1928至1937年商會與政府關係的概念框架〉一文，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試圖提出一個理解1928-1937商會與政府關係的概念框架。他認為這個時期商會與政府的關係，建立在類似社團主義的制度上，雙方互相合作。政府通過這一制度化的合作結構，對商會實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商會則透過此一結構參與國家事務，表達利益訴求。近代中國由於民族主義和現代化兩股思潮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動力，政府和商會都以民族國家建設作為共同努力的目標。而由於民族國家建設包含許多層面，而且在不同情勢下有不同的需求，政府與商會制度合作的形式和內容因此必須不斷地進行創新、改變。近代中國商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便是伴隨著對制度合作不斷進行創新的過程發展演變。

陳忠平，〈長江下游商會與辛亥革命關係新探〉一文，認為過去學界對中國商會史的研究，多從革命的角度出發，討論商會是否對革命運動有所貢獻，而不是從商會的立場來評價它們的歷史作用。他認為應當改變這種歷史觀點的論述，根據商會自身的社會經濟利益和政治策略，重新檢討它們的歷史地位。他分析長江中下游商會領袖和成員的背景，指出儘管現代企業投資僅占商會領導人經濟活動的次要或不重要的部分，但他們控制了當時城鄉經濟生活中較現代企業更為重要的商業和金融業，並擁有其他政治社會特權，商會因此成為極具影響力的社會經濟組織和政治力量。由於他們的社會菁英背景以及在地方上享有既得利益，使他們傾向於以妥協的手段來處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衝突。他們力圖透過漸進改革而非暴力抗爭的方式，來維護地方社會以及他們自己的利益。武昌起義後，長江下游商會及其領袖雖然都被捲入辛亥革命的浪潮，但是他們並未一味附和革命，而是考量自身和地方利益，根據地方形勢做出反應。他們的態度和行動，使得長江下游的形勢並未轉向激烈的革命道路，絕大部分地區是以和平不流血的政治變革形式完成政權轉移。以後商會與南京臨時政府及袁世凱政權的合作衝突，也是基於同樣的利益考慮。陳文指出，商會領袖涉足地方和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與西方學者所說的「公共領域」相符。而商會的組織規則和民主原則，以及它在辛亥革命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立自主性，也與西方的「市民社會」十分接近。

葉漢明，〈從商會看地方領袖與國家政權的關係——民國時期山東濰縣個案的探討〉，觀察山東濰縣商會領袖，早期多由士紳擔任。20世紀以後，濰縣土布業、棉紗業成為各業之首，錢莊以紗線商人為放款主要對象，紗線商人與錢莊商人成為地方商人的佼佼者。他們認為商會應由熟悉商業人士主持，1917年商界人士潘同科當選商會會長，連任至1929年病逝為止。商會由紳商領導過渡到商人領導的機關。隨著濰縣工商業的發展，商會時須處理各類商務糾紛。文中舉1934年濰縣與江西南昌布業競爭引起的糾紛為例，說明商會在維護業界利益上發揮功能。作為新興城市菁英分子薈萃的社群，商會一直在地方治安的維持、修橋、救濟災難、在戰爭中籌辦餉糧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顯現商會的「公共領域」功能。商會領袖也在此領域愈顯其重要性。但這個民間領域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其領導層常受到由上而下或由外而內的政治勢力滲透。1928年濰縣國民黨部成立後，開始扶持新的商界領袖，操控商會，商會也經常幫國民黨籌措軍餉。對日抗

戰期間，濰縣為日軍所占，商會受日人控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恢復在濰縣的治權，黨的力量又滲入商會。葉文指出，從濰縣的例子來看，地方城市菁英參與的地方議會、自衛組織、救濟事業等已顯示「公共領域」的存在。但是，商會領袖利用其身分地位，在地方和中央之間左右逢源，謀取財勢、權位，未能追求整體性的民間權益，發展出更具自主性的社會空間，限制了它向較高層次的「市民社會」過渡。

馬敏，〈從工商聯到商會——中國商會的現代演變〉，論述中國大陸從商會組織改組為工商聯，又從工商聯發展為商會的歷史轉變。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實施新經濟政策，決定將舊商會改組為工商業聯合會，各大中城市相繼在舊商會、舊工業會、舊同業公會的基礎上成立工商聯地方組織。所有國營、私營、公私合營的工商企業、合作社，以及手工業者、行商、攤販皆可入會。工商聯實施全國、省、縣3級制。中共中央特別要求加強黨對工商聯的領導，使之成為統一戰線的工具。工商聯成立後，最主要任務是協助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府推進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工商聯的活動被迫停止。1970年代末，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工商聯恢復，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有其作用，但是由於組織結構、會員構成、社會功能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1988年，工商聯「六大」修改工商聯章程，規定工商聯是「中國工商界組織的人民團體，民間對內對外商會」，所有公私企業、行業協會、同業公會等皆為其會員，工商聯開始向民間商會轉軌。馬敏指出，現有工商聯在許多方面還不能夠真正承擔起民間商會的功能，他希望工商聯能夠借鏡歷史上的商會，提升其功能，多為廣大會員和工商企業提供服務，保護工商業者的根本利益，促進工商業的發展。他也認為工商聯應有別於官方機構和政府組織，無論行政或經濟，都必須擁有如同以往商會一樣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政府應儘快制定「商會法」保障其獨立自主性，使工商聯能發揮維護會員和企業合法權益的功能。馬敏指出，中國現階段除工商聯所代表的民間商會系統外，還有為促進對外貿易而成立的國際商會，以及不從屬於工商聯系統的進出口商會等組織，應仿照民國時期中國商會聯合會的組織，將分散的商會組織聯結起來，達到合作、協調、共同發展的目的。

李培德，〈二次大戰結束前香港的華人商會〉，利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保存已故仁井田陞教授蒐集的資料，對香港的華人商會進行分析。香港為

英屬殖民地，最早由西人成立的香港總商會以及民間組織，華人都被排拒於外。香港華商為維護自身利益，乃組織自己的商會。香港的華人商會，具有獨特的殖民地社會特色。國內商會係根據清政府頒布的「商會法」，香港華人商會則必須根據殖民地政府的法律申請設立，而不必向國內政府註冊，因此商會與國內的關係並非如其他海外華人商會般直接。華人商會係根據香港政府頒行的公司條例設立，有行業商會和地緣性商會，行業商會包括洋紙行、藥行、中藥行、蔘茸藥材行、鮮魚行、疋頭行、雞鴨行、牛業行、豬肉行、米行、新舊銅鐵行、籐行、柴業行、果菜業、飲食業、木炭業、鞋業、金銀業貿易場等；地緣性商會最多者為廣東各縣旅港商人所組，包括東莞、鶴山、新會、番禺、中山、增城、順德、寶安、瓊崖等商會，以及旅港福建商會。商會經費的主要來源為會員繳交的會費，各商會繳納標準不一。有些商會以會員繳納會費的多寡來決定他們的權利，相當商業化。華人商會成立的目的，是保障會員利益、推動行業發展、排除同業之間的糾紛。商會為維護行業利益，對會員的財務信譽極為重視，商會組織章程中多有對買賣賒欠賬項延滯清理者訂立處罰規定。商會規模以中小型為多，組織模式較接近行會。商會原先多設於港島，尤以中環、上環、西營盤一帶為多。1930年代以後，港島商業逐漸擴展到對岸九龍地區，以「港九」為名的商會陸續出現。

何佩然，〈地方經濟力量的興起與衰落——香港新界沙田商會的個案〉，利用大量口述資料和沙田文獻，分析香港新界沙田墟市發展與商會興衰的關係。1941年以前，沙田居民主要以農耕為生，自給自足。1950年以後，由於中國大陸情勢劇變，一些為逃避戰火或不願在中共統治下生活的民眾，大量移居香港，沙田地區人口數亦快速增長。大量的移民，不但帶來新的勞動力，也帶來新的流動資金，推動沙田經濟轉型。1956年沙田墟建立，各種商舖紛紛開設，沙田經濟開始有新的樣貌。沙田墟商戶都由香港市區或中國大陸移入，為了維護經濟利益，各商戶於1959年組織沙田商會。隨著商舖日增，入會者漸多，除沙田墟之外，附近大圍、西林、白鶴汀新街市等地亦有商戶加入。至1973初，沙田商會會員158戶，其中沙田墟95戶。沙田商會領導階層透過民主選舉產生，始終由十多位較有經濟實力的商戶執掌。商會發揮團結聯繫、調解糾紛、濟弱扶危的功能，對地方事務亦積極參與。1976年，政府宣布重建沙田計畫，位於沙田心臟地帶的沙田墟面臨拆除的命運，商會積極與政府斡旋。由於政府對新市鎮的發展規劃勢在必

行，商會內部對拆遷賠償及安置問題意見紛歧，1980年沙田墟終究被拆除，商會亦告結束。

張素玉，〈華商組織、國家與政治特權——以菲律賓為例〉，分析菲律賓的華商組織與特權政治之間的關係，特別側重菲華工商會聯會領導人與菲律賓歷屆總統關係的討論。她指出1954年菲華工商會聯會成立，將全菲150個以上商會和貿易協會組織起來，成為菲國華人最具影響力的團體。其時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極力爭取菲國華僑支持反共，而華人的經濟活動受到菲國反華法令的限制，亦欲尋求中華民國政府的保護協助，中華民國政府對聯會有極大的影響力。1965年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競選總統，得到中華煙草協會及中華製衣業協會主席拉爾夫·紐布萊（Ralph Nubla）贊助支持。馬可仕當選總統後，紐布萊登上聯會主席之位，菲國總統得以左右聯會領袖的態勢正式浮現。聯會領袖藉由對總統的支持，爭取華人的權益及提高自己的財富地位；總統則以聯會作為控制華人的工具，並利用它來實現個人的政治目的動員華人進行財務和政治支持。1975年馬可仕准許所有華人歸化菲籍，成為菲國公民，是華人在特權政治下受惠的顯例，馬可仕則在政治和財務上向聯會及其領袖們要求支持，以為回報。馬可仕垮臺後，多明哥·李（Domingo Lee）因與科拉桑·艾奎諾總統（Corazon C. Aquino）的政治聯繫而當選聯會主席，艾奎諾政府利用聯會來吸引外資尤其是華資頗獲成效。現任的聯會主席陳永栽（Lucio Tan）也是因其與總統約瑟夫·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而當選。不過，目前菲國輿論對埃氏無能及引用親信批評日趨激烈，矛頭亦指向陳永栽等華人，菲國社會因此存在反華情緒，聯會領袖與總統之間的緊密關係，可能成為華人社會的負累。

以上 7 篇論文，包含地方商會（如濰縣商會、沙田商會）和區域商會（如長江下游商會）的個案研究，以及對某一時期商會的綜論分析。從商會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它呈現幾個方面的特色：首先，以往商會史研究大都側重上海、天津、蘇州等地，這些商會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大抵為學界所熟悉。本書論文不但對山東濰縣這種較不受注意的小商會進行觀察，同時將研究範圍延伸到香港和菲律賓，提醒我們在中國國內除了上海、天津、蘇州之外，其他地方商會以及海外商會發展的情況，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商會史研究仍有許多待開拓的空間。另外，從時間的角度來看，早期學界對商會的討論聚焦於清末民初時期，近幾年漸

及於國民黨北伐前後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關於對日抗戰時期以及中共取得政權後的發展，學界較少注意。馬敏的論文探討了1949年以後舊商會改組為工商聯，到1980年代末工商聯向民間商會發展的歷史轉折，也提示我們此一歷史階段工商組織與政治發展的關係值得深入探究。

本書的另一特色是，所有論文已不再用階級史觀來進行探討。陳忠平對長江下游商會與辛亥革命關係的討論，強調從商會的角度而非以革命為中心的史觀來看問題。筆者在十餘年前即曾指出，商人參與清末地方自治運動、國會請願運動、革命運動，是基於民族危機感、救亡圖存意識、地方商業利益，以及對清廷的不滿，而不是任何的「階級意識」。由於他們以保全地方、避免商業秩序受到嚴重破壞為念，並不支持激烈的革命行動，而是以其力量促使政權和平轉移。<sup>1</sup> 陳忠平的論文正呼應這樣的觀點。

事實上，本書各論文已經澈底拋開階級史觀，有些論文試圖將西方流行的理論運用到近代中國歷史的解釋上。陳忠平、葉漢明在討論商會與政治的關係上，都對其間是否存在「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特性加以思考，張志東更試圖尋找一個可以解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商會與政府關係的概念框架。拋棄舊的階級史觀，以新思維來進行研究，無疑地將商會史研究推進了一大步。借用「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概念來思考中國歷史，也使得商會史研究的內涵更為豐富。不過，正如多位西方學者所指出的，中西歷史發展的軌跡和內容不同，將西方模式拿來解釋中國歷史必須特別謹慎。商會史研究者常強調商會的獨立自主性和民主選舉等，具備西方「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特質。但是，哈伯瑪斯所說的「公共領域」特別強調批判的功能與言論的重要性。近代中國商會是否具備這些特質，顯然還需要更進一步討論。即使就獨立自主性而言，中國商會或許在某個階段或某些事物上，能夠擺脫政府或其他力量的干預，但是更多的時候它並無法抵抗政治力的介入。袁世凱推動帝制時，商會是被動員支持帝制的重要社會組織；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了動員商人和商會支持革命，對商會所進行的改造或

---

<sup>1</sup> 參見李達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190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第23期上（1993年6月），頁171-220；李達嘉，〈從「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關懷和抉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1994年6月），頁237-282。

控制，也已經是許多學者關注的議題。中共建國後，將商會改組為工商聯，並將它定位為統戰機構。這些都顯示商會離獨立自主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距離。從菲律賓華商組織的發展，也可以略窺商會與專制政權或獨裁政權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就此而言，本書有些論文借鏡西方理論來理解近代中國商會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有些論文則呈現不同的歷史面相。這些針對不同歷史階段所進行的討論，對全面了解中國商會與政治的關係有很大的幫助。其間存在極大的思考和對話空間，有待學界繼續開拓。